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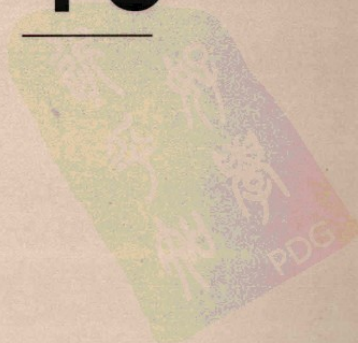
姚雪垠文集

学习追求五十年

回忆录



16



姚雪垠文集

16

学习追求五十年

回忆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雪垠文集. 第16卷/姚雪垠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126-4

I. ①姚… II. ①姚… III. ①姚雪垠(1910~1999)
—文集②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313 号



本卷说明

本卷收自述和纪念类型的文章 21 篇,包含了作者撰写的回忆录、不同时期的自我情况介绍、创作经历回顾和纪念师友的文章,编排亦大体循此顺序。

凡公开发表过的文章,篇末均注明发表日期和报刊名称;未发表过的手稿、讲话整理稿,亦尽可能注明写作时间、地点。作者于文末自注的日期和自撰的“附记”,均予保留。另有若干篇曾发表而未收入本卷的作品,则在卷后“存目”中列出篇名。

本卷编校时,对作者习用的助词用法和特殊用语、引用的外国书名和人名的译法,均未改动,仅对文字上的脱误作了技术性的订正。

目 录

学习追求五十年·····	(1)
我的故乡、家庭与童年·····	(169)
七十述略·····	(219)
我走过的学习道路·····	(238)
我的前半生·····	(248)
八十愧言·····	(283)
“农村三部曲”——梦断开封·····	(290)
今后三年半工作规划和说明·····	(302)
我的粗浅经验·····	(308)
我的治学格言·····	(322)
我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感想·····	(325)
我的无止境斋·····	(330)
感激与惭愧·····	(331)
雁门关外的雷声·····	(336)
悼烈士梁雷·····	(349)
怀念崔嵬同志·····	(357)
老将殊勋青史在·····	(368)
读旧信追怀哲人·····	(379)

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对《李自成》一书的 关怀与支持	(384)
为纪念茅盾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而作	(393)
纪念与感激	(419)
附：本卷存目	(426)

学习追求五十年

题 记

我今年七十岁。回顾我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活动，虽然不是全无成绩，但是距离人民的要求很远，距离我自己的希望也很远。没有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常使我暗自惭愧，也使我有时心中痛苦和感慨。

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我在学习上走过曲折的道路，有可取的经验，也有错误的教训。我处在十分闭塞落后的故乡，少年时代常在失学之中，苦闷、悲观，只感到毫无出路，谈不到有什么人生目的。进入十九岁这年春天，我离开了一年到头烟灯昏黄，哭声和吵骂声不绝于耳的家，到了开封，寻找出路，从此结束了浑浑噩噩的少年生活，开始了有意识的学习道路，也有了自己的追求。所以我这部回忆录性质的稿子，对十八岁以前的生活只简单地交代一笔，而集中笔墨写十九岁到七十岁的学习和追求。

由于不是一般生活的回忆录，所以生活上的许多经历纵然写出来会引起读者很大兴趣，我或者一笔带过，或者根本不提。我希望这部稿子发表之后，过去曾同我一起生活过的朋友或不相识的同代人如发现我对事件、时间、地点等有记忆错的地方，请写信告诉我，不胜感激。

一 从十九岁开始的征途

一九一〇年十月十日,我生于河南邓县西乡姚营寨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我原名冠三,八周岁以前不曾认字,进入九岁时候,起初由我父亲教我认字,几个月后开始进入私塾读书。在私塾读了一年半,考入教会办的高等小学。三年毕业后到信阳一家教会中学插班初中二年级。这是一九二四年的秋季,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这一学期没有告终,吴佩孚在战争中失败,退到了鸡公山。信阳一带登时空气紧张,车站外挖掘战壕。教会为怕信阳遭受战祸,命令学校提前放假。我同我的二哥和另外两个学生从信阳到了驻马店,然后向西,往邓县奔去。我们走到唐县或泌阳境内被李水沫的杆子抓去,我二哥成了肉票,而我成了一个土匪头目的义子。过了一百天,到了第二年春天,杆子被打散,我回到家中。抗战末期我写了一部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长夜》,就是写的这一段土匪生活,反映二十年代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一段土匪生活,对我以后写《李自成》很有关系。

从此以后,我的少年生活有几次变化,基本上是失学在家。有一段不长的时间到樊钟秀的部队当兵。到了一九二九年春天,我为要找出路,到了开封。一位同乡学生替我造了一张假文凭,暑假考入了河南大学预科。由于我是失学青年,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里要无师自修各门应考功课,包括英文、代数、几何等等,所以非拼命用功不可。那时家中无钱给我,有一段时间因内战交通中断,更得不到家中接济。开封有担挑卖豆面丸子的,挑子放在街边,供劳动人民和穷人充饥。我基本上靠这种食物度过多日。附近两条街上的几个卖豆面丸子的小贩,谁的碗中大概多盛一个丸子,我都十分注意。我每顿只敢买一碗,根本吃不饱。有时我为节省钱,不去蹲在街边吃丸子,便出去买一个甜瓜回来,连皮吃下去充饥。我试

着写了一篇小说，投寄《河南日报》副刊，幸而发表出来，到下月初通知我去领取五毛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小说，第一次得到稿费。那时候是使用银元，所以五毛钱对我是重要接济，可以帮助我度过几天。由于过分的用功和严重的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垮了，随时会头晕，眼冒金星，一睡觉便梦魇，一梦魇就必须别人将我用力推醒，或者我自己滚到床下跌醒。

由于我对当时的社会充满愤恨，所以入学不久就积极参加中共开封地下党领导的政治斗争。第二年暑假被捕。被释放后继续上了一年学，到一九三一年暑假，学校当局趁着在校学生很少，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理由将我开除。挂牌开除的那天午后，一个同学借给我十几块钱，叫我立刻逃走，免得第二次被捕。我很快上火车逃往北平。从此以后，我艰难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学习道路。

开封的两年学生生活，是我一生中的关键年代。第一，中国共产党当时在白区执行的是“左倾”路线，学生们不断地发动学潮，还常搞“飞行集会”，向工人和市民突击宣传，散发传单，作不必要的暴露，招致不必要的牺牲，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却教育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我当时参加了开封地下市委领导的学潮委员会和其他活动，永远不能忘记这短短的两年时间中给我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第二，在这短短的两年中，我读了在当时白色恐怖条件下我在一个内地省城所能找到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我初步掌握了一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对我以后的学习起了启蒙和引路作用。第三，对新文学和新史学发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

当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奔腾前进的时代潮流，宏伟的历史运动，鼓动着、教育着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前进，无数人为着崇高的理想而战斗，而献出生命。我是这一时代潮流中比较蹩脚的学生，但是到七十岁回顾来路，假若我还有一点点成就的话，我

不能不感激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历史运动(包括文化和思想的革命运动)对我的启蒙、教育和熏陶。

我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尽管我处在风气闭塞的故乡,又上的教会学校,但是时代的春风也徐徐地吹到了我的身上,北伐的浪潮更给了我强烈影响。我到了开封的时候,国内史学界、社会科学界正在热烈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建立新史学;而文学界正在掀起普罗文学运动,同时大量介绍苏联的新作品和文艺理论,这后者被称做“新兴文艺理论”。史学界的新浪潮和文学界的新浪潮都给了我很大影响。虽然我国当初所谓普罗文学的作品犯了作家缺乏生活和艺术粗糙的毛病,致命弱点是“标语口号文学”;但是另一方面,它对那个时代具有积极冲击的力量,它呼唤着青年们投身到革命的斗争中去。这一派公然用文学为武器同反动势力战斗,认为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工具。它的积极方面,对我有巨大作用,使我对文学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五四新文学革命给予我第一次启蒙作用,而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普罗文学运动包括在内)给予我第二次启蒙作用。如今回顾往事,我衷心感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的文学先驱者。

还有一种历史情况,如今一般青年人大概不清楚,我愿在这里顺便谈谈。

“五四”以后,文学的主流虽然是健康的现实主义,但实际情况并不简单,既有现实主义,也有反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也有各种流派。在反现实主义的不同流派中,最容易使天真青少年受不良影响的是宣扬颓废思想、消极厌世、灰色人生,以及感伤情调。这一思潮的出现,既有我国的社会条件,也受了欧洲近代文艺思潮中所谓“世纪末病”或颓废倾向的影响。我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本来是毫无生气,充满着忧郁和没落气氛,恰好读了一本五四新作家的感情不健康的小说,使我对人生很悲观,曾经将自己的名字改

为“浮生”，是出自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一句“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竟有这种思想！到开封以后，我开始学写文学作品，用的笔名是“雪痕”，出自苏东坡的两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三十年代前期，某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流行，与一部分人的苦闷、悲观、没有出路的心情大有关系。例如人们喜欢读李后主的词，因为其中有许多感情沉痛的、感怀身世的句子。人们喜欢读李清照的词，因为其中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有“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有像《声声慢》那样的“凄凄惨惨戚戚”等等抒写愁思的佳句名篇。对于黄仲则的诗，人们都喜欢他的《都门秋思》一组七律，而在这一组七律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人们对于沈复的《浮生六记》欣赏，不仅因为它生动地描写了生活，写出了对封建家法的一定反抗，而更重要的恐怕是写出了封建社会中小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和感伤情调。对古典作家的全面评价是一回事，而读者欣赏文学往往各取所需，借他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

以上曾经流行一时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也曾经爱读，然而我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摆脱悲观、厌世思想和感伤情调，以及反对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冲淡和闲适情趣，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斗争。思想感情的变化促使我将“雪痕”的笔名抛弃了。

我国“五四”以后的史学界，除陈旧的“正统”史学外，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前期曾起过较大的影响。我曾经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编辑的前人的辨伪著作。我认为古史辨派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派生的，是对墨守旧说的“正统”史学的一次猛烈冲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轻视古史辨派的人们认为这一派的学者们不懂得社会发展史的科学理论，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嘲笑顾颉刚先生将禹解释成一条爬

虫,鄙视胡适怀疑屈原如荷马那样是传说中的人物。但这不是古史辨派的主要方面,我们不应该以偏概全。我当时从这一历史学派受到很有益的启发,例如打破对许多古圣先贤的著作和古史传说的迷信,只要证据确凿就可以怀疑,进行考辨真伪。还使我知道有些重大问题(例如孔子“删诗”说)原来是不可信的,而且早就有人提出怀疑了。这一学派还使我明白:有些历史人物常常经过“加工”,好的愈好,坏的愈坏,与本来面貌相去渐远,这叫做“箭垛式的人物”,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规律。直到现在,我仍然肯定古史辨派有这些积极方面的贡献,不容抹煞,它是属于五四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开封以后,有一本史学著作对我这一生起了重大影响,就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使我初步知道从顾炎武以来清代学者们的值得我们认真继承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那种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和勤于收集资料,以众多经过推敲辨析的资料为基础,以老老实实的态度论证问题,然后得出结论,这种治学方法,使我非常佩服。后来我读了清代学者的著作,加深了认识。等到我读书渐多,知道外国较有成就的史学家与其他学者,都是如此。我也明白,像梁启超这一代学者以及古史辨派,都懂得使用进化论作武器,已经比清代朴学家们有了发展。我认为倘若将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就会更利于学术研究。如今人们多知道我为写《李自成》使蝇头小楷抄写了不少卡片,而很少人会想到是由于我在青年时期受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的启发,是学习了前代学者们的部分经验。(他们还有不少可贵的经验我没有能力学习。近代态度严肃的学者,都重视卡片工作,被认为是起码的一种科学方法。)我自己没有机会除写小说外兼从事学术研究,但我喜欢看别人的学术著作。我每读到别人的学术论文,看见态度不严肃的种种海派学风,总不免产生反感,这也是从青年时候养成的脾气,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前期,即一

九二九年我到开封读书到七七事变爆发这几年。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要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投入了关于中国现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同时展开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史问题的论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就是在社会史论战中产生的。我对这次论战相当感兴趣,也浏览了不少文章。后来郭沫若同志的《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为新史学奠定了基础,尽管我当时不能完全读懂,但我是有些常识的,知道这是充分利用了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三位学者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点而写出的开创性著作,不尚空论。正如一般小青年常有的天真热情,我在封面上写了四个字:“心爱的书”。这是我对郭沫若在学术上最崇拜的阶段,到我三十岁以后,这种崇拜心情就逐渐减退(有些问题,在这部回忆录中将提到)。总之,我当时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小青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建立时的热心读者,对我后来所走的道路有重要影响。

每一个有特点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成长道路:生活的道路和学习的道路。以上所谈的是我在青年时代所走的学习道路,和当时许多青年作家的道路既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我的学习道路,概括起来,约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我的“可塑性”较大的时候,我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的深刻影响,在某些方面也参加了一些斗争。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比较蹩脚的学生,可以说辜负了党的期望。第二,我从“可塑性”较大的时候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虽然只是最初步的粗浅常识,但是我很珍惜当时所获得的常识,以后总在不断地学习运用和要求提高,不肯丢掉这个武器。第三,我接受了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传统。第四,我对历史科学发生浓厚兴趣,初步认识到什么是较好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第五,我这时对我国的古典文学也有广泛兴趣,以后不断地提高我的修养。为什么我在中年时

代决定向写长篇历史小说发展？为什么我的历史小说《李自成》在处理历史问题和表现手法上不同于别人所写的历史小说？为什么《李自成》在风格上带有浓厚的中国气派？我在前边自述的，从十九岁开始到以后几年中所奠定的学习基础和道路，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我也附带说一下，在我的少年时代，尽管常常在失学中，但我通过自学，初步掌握了写“文言文”的技巧，基本上会做“古文”，也大体上可以做不很严格的骈体文。这些少年时代的初步锻炼，随着后来读书渐多，有所增进，对我写《李自成》很有帮助。如果缺乏对古典文学写作能力的长久锻炼，临阵磨枪，《李自成》中一部分人物的对话、书信、奏疏、诏谕、祭文等等，是没有办法按照小说的艺术要求随手写出来的。在河大预科的两年中，我虽然忙于读各种书籍和参加学生运动，不再投稿，但是我的写作能力仍然有所提高，这为我以后过投稿生活准备了条件。

二 在贫病艰难中开始了作家生活

我逃到北平以后，断绝了再进学校读书的念头。当时北京大学继承五四时代由蔡元培开创的自由传统，校外青年可以自由旁听，自由找教授求教。北平当时不再是政治中心，被称作文化城。很多失学的、失业的青年想寻找知识，来到了文化古城。许多在政治上受迫害、被追捕的青年，从内地来到文化古城，暂时住下去读读书，再做计较。还有许多有雄心壮志的青年，想在艺术上有所成就或想在文学写作上谋出路，害怕上海费用高，兼喜欢有最好的读书环境，来到了安静的北平。那些想过写作投稿生活的，在当时叫做“爬文坛”。我是以上三种性质兼而有之。但是我始终没有到北大旁听过，没有拜访过任何教授，也不拜访文学界的知名作家。我最初来到北京，并不希望将来做作家，而是希望自己通过若干年埋头图书馆刻苦努力，能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中国文

学史家。后来因为生活问题没法解决，不允许我长期坐图书馆，不得不靠投稿生活，转向“爬文坛”的道路，一步一步地变成了青年作家。但是我仍是那个脾气，依靠自己努力，硬着头皮投稿。现在随便谈一个小笑话，说明当时北平的文坛情况和我是如何的不与文学界名人接触，自己埋头用功。

当时住在北平的有两位作家威望很高，人们称作“京派作家”。老一代的作家以周作人为代表，好像是居于“盟主”地位，人们尊称他“知堂老人”。我尊重他有学问，但不赞成他提倡冲淡和闲适情调，不但没有去拜访过他，后来还在曹聚仁主编的《芒种》半月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批评和讽刺他。在北平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人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要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的文坛重镇，许多在北平的青年作家都常去看他，那是很自然的。我也喜欢他的文笔风格，喜欢他的一些短篇和中篇《边城》，但是我始终没有拜访过他。一九六二年秋天，我因《李自成》第一卷在准备出版之前要听取专家意见而来到北京。一天，我由江晓天同志陪同，去拜望从文同志。他拉着我高兴地说：“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今天第一次见面！”他的意思是在北平时他住在西城，我住在东城，我给他寄过稿子他发表了，为稿子事通过一次信，但没有见过面。他对过去的事比我记的还清楚，又说，“你给我的信虽然是随手写的，可是我看出来你那时对古典文学有相当根底。”我那时是初学创作的文学青年，这唯一的一次通信竟被他牢牢记住，而我早已淡忘了。现在回顾数十年的经历，我的不喜欢看朋友，拜访有名望和社会地位高的人，是我的一大缺点，也给我前半生带来了一些困难；但从老年看，也有好的一面，即时间抓得较紧，强调作家和学者的事业成就要靠自己从扎扎实实的努力得来，不依靠如今天有些人们所讲的“关系学”。

七七事变前,知识青年在北平的居住处大体群集在三个地方,即西城的中国大学一带,东城的北京大学一带和朝阳大学一带。朝阳大学一带我没有去过,西城也几乎不去。我的根据地是在北京大学附近的沙滩一带,往东去是逛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往西去坐北平图书馆的阅览室。至今时隔四十多年,我感谢北平图书馆,它是我为打知识基础而读书的地方;我常常怀念它,可惜我再也不能分出时间重去。

我初次来北平是落脚在沙滩的一家小公寓,名叫蓬莱公寓。我住的是一间坐西朝东的小房间,每月连伙食、茶水、电灯在内只要十块钱。正如我前边说过的,那时我还没考虑专心走创作道路,而是希望通过艰苦的自学,将来能够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史家。当然这全是一个小青年的天真幻想。我常到北平图书馆看书。生活暂时靠朋友接济,日子过得很苦。往往每天早饭后步行到北平图书馆看书,中午或回公寓吃饭,或在图书馆附近随便吃点东西。那时图书馆不像解放以后,除星期一以外,天天开馆,晚上九点闭馆。我常常等到响过第二遍闭馆铃声以后才从图书馆走出来,步行回沙滩。那时的金鳌玉蝀桥比解放后的桥面窄得多,两边都种莲。我印象最深的是深秋之夜,冷月悬空,行人稀少,枯荷败叶在秋风中瑟瑟作声。我每晚走在金鳌玉蝀桥上,总要对月下的北海停留一阵。风吹空筒蓝布长褂(那时我没有穿过毛背心或毛线衣),颇有寒意。在图书馆中用心看书的时候,别的事不多去想;回沙滩的路上,特别是月下站立在冷冷清清的金鳌玉蝀桥上,常不免想到下月住公寓的钱如何解决,冬衣如何解决,今后长此下去,如何养家糊口(当时我在开封结婚不久)等等迫切的生活问题,心中发愁。

在沙滩,我住的公寓门前有一片空地,搭一个大布棚,晚上卖稠稠的小米粥。我从图书馆回来时,买一碗小米粥,同拉黄包车的和各种苦力挤在一起,喝完粥,浑身温暖,回公寓睡觉。

九一八事变这年冬天，我回到河南。第二年春季我因生活没办法，到豫北淇县的楚旺中学教书。秋天到信阳义光女子中学教书。寒假我回到开封，找不到工作，同妻子住在岳父家中，经济很困难。有时在家看书，有时到河南省立图书馆看书。这一段生活，楚旺中学和河南省立图书馆给我的印象较佳、较深，令我常常怀念。楚旺是卫河边上的一个小镇，利用卫河楚旺关的一部分厘金款子办这个中学（当时淇县没有县立中学），经费充足，学校周围是农村风光，办学的几个人也都热心于本地教育事业，朴实肯干。河南省图书馆设在开封龙亭湖边的二曾祠内，垂柳摇曳。阅览室较大，但看书的人不多，有时少得只有两三个人，甚至剩下我一个人。檐际小雀啁啾，更增加阅览室的寂静。坐在高柜台里边管出纳书的是一个叫做薛连仲的青年工人，默默无言。像这样的看书环境，我以后再也没有遇到了。

大概就是这一年，我同王国权、苗化铭等几个朋友在开封北书店街办了一个小书店，名叫大陆书店，出了个小刊物《今日》。《今日》第二期出版后，国民党要抓人，我同王国权、苗化铭逃离开封，到巩县康店王国权同志（国权本姓康）的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大陆书店的一个店员被抓走了。

这几年，一直到抗战爆发，我有时住在北平，有时回到河南。在开封读书时我大概就患了肺结核病，这时因为我比较用功，生活又苦，肺结核病严重起来，差不多每隔半年就来一次大口吐血。吐血之后，我有时留在北平，有时回到河南去杞县大同中学居住，等身体稍好一点再离开。大同中学是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先生办的。他是我的老师。他很喜欢和进步青年接近，也愿意帮忙。大同中学就是在进步青年的推动下办起来的。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学校中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抗日救亡和民主空气很浓厚，而相反的却没有国民党和蓝衣社组织。这一群进步教员都是青年，有时做得过于露骨，当然要引起当地的国民党忌